

---

## 文化分组讨论概要

主持人 张 琢 (ZHANG Zhuo)

从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路线，到2003年11月本次爱知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好经历了25年。在这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探索中循序渐进地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中国经济的快速推进，成为这一时期最令世界瞩目的经济现象。经济体制改革所诱发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的变化，亦或先或后、或显或隐地体现在政治生活和政治观念上。如：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为整个改革先导的思想解放运动；80年代中期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步推进而开展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讨论；1989年政治风波后政治改革的休克；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接轨，逐步酝酿出了新一轮的启蒙思潮，催促着政治改革重上征程。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中，敏锐的知识分子精英常常起着先锋作用。在当前的中国政治改革中，中国共产党内的民主派和学术界执著于中国发展道路探索的知识分子，又一次以自己的历史责任感，充当了新启蒙的角色。同时，由于当前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使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主张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征。所以，本次国际讨论会文化组分会的研讨题定为“新启蒙、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现代化论及后现代问题”，参加本组讨论的学者有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志琴、台湾大学教授叶启政、夏威夷大学副教授周晓、神田外语大学助教授兴梠一郎、神户大学助教授绪形康和爱知大学教授周星。主持人为爱知大学教授张琢。

本场研讨会首先由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教授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政治影响》为题作了主题报告，他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中的自由派与新权威主义之争，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自由派与新左派的思想分化，以及新左派的主要学理资源、理论依据及其内部的温和与激进派两大类型，并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对于未来中国政治走向可能的影响作了若干推测。

他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内部出现了自由派与新权威主义之争，这种自由与权威之争，实际上是20世纪初期自由民主派与开明专制派之争的历史延续。自由派强调个人自由权利、民主化，而新权威主义者则强调秩序与权威。但双方在中国最终的民主目标上并没有根本分歧。90年代中期，由于苏联东欧激进民主化的挫折，由于市场化过程中知识分子相对得益，由于英美政治哲学开始在知识分子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主流开始走向温和化，中国知识界对激进自由理念重新反省。自由派知识分子中间派（即温和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新保守主义（即新权威主义）逐渐合流，成为民间社会思想的基本趋势。随着市场经济深入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贫富分化、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权钱交易、腐败与社会不公问题，逐渐在中国社会突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

下，知识分子开始出现三种不同思想价值趋向：一，知识分子中的新右翼的观点认为，改革中的上述种种消极现象是现代化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不可避免的代价，只要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会逐渐化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高于一切。这种主张的人中有新权威主义者及自由派右翼。第二种是自由中间派，认为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加强多元社会对权力的监督，以民主来制衡腐败与两极化，改变权力的垄断地位，才是根本的出路。第三种观点即新左派，把这一切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公平看作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伴随的现象，认为中国现在实际上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主张重新回到平等主义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他们“重新发现”了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价值。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等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

萧功秦将新左派分为“温和”与“激进”两种类型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并对时下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之争的三种前景做了预测：第一种前景是民主化条件下的思想多元化。第二种政治前景，是激进新左派与现代化过程中失利的下层绝望阶层结合，发动一场反对“邪恶富人”的运动，力求在中国土地上去重新建立一个理想的没有人剥削人的公平世界。第三种可能的前景，是民粹主义民主与权威主义的两极震荡，陷入拉美化的政治陷阱。最后，他强调：中国虽然充满矛盾，但经济发展态势基本良好，出现现代化断裂的可能性并不大，发生后两种趋势的概率并不高，这一分析主要在于理论上的警世意义。

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志琴以《老革命的新觉醒——〈炎黄春秋〉评析》为题，对以《炎黄春秋》杂志为园地的中共党内的老革命家、理论家中的民主派的思想 and 政治动向做了介绍，引起与会者的很大兴趣。她介绍说：该杂志是由一批已离体的党政军领导人发起和支持的刊物，它以“求实存真”为宗旨，靠讲真话赢得众望。不少作者曾长期担任中央或地方领导，是中国政治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他们从青少年时期就追随共产党，长期以来习惯以党的利益为重，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专制主义的影响，成为党的驯服工具，鲜有个人的自主意识。文革的浩劫和共产党的屡次失误，使他们经历了信仰的动摇、彷徨和重新找回自我，现在再度举起他们早年追求而又一度失落的民主旗帜，力求从体制内部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这些人是共产党的补台派而非拆台派，并不是自由主义者，但是在中国自由主义尚无立足根底的情况下，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自由主义的代言人。

叶启政的发言题目是《文化、政治与经济搓揉下的中国现代化》。他指出，就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与19世纪的满清中国一样，当代中国推动的“现代化”，基本上是对18世纪以来的西方启蒙理性文明的一种反应，它所反应的不只是曾经发生在西方世界的种种现象，而且同时也承担了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意识。当然，中国人所做的反应是“中国式”的，也就是说，其反应乃是在既有的传统文化模式的支撑下进行的，套句话来形容，情形有如“西餐中吃”。相对于西方现代化开始于资产阶级假“平等自由”的口号向既有的主导政治势力争取“公平正义”，现阶段的中国现代化基本上却是始于政治与经济势力的大结合，更恰当地说，是政治渗透经济，把后者纳入其既有的运作理路之中。然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格中

内涵着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成分，它势必促使未来的中国社会面临着政治民主化的问题，而这又是贯彻公平正义所必须考虑的基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人所面对的问题至少应区分为初期转型、中期奠基、成熟蜕变等三个阶段来讨论。无论是自由主义作为“理想反照性”的主张，或左翼思想反应的“现实修补性”的主张，它们所牵涉的基本上都是“初期转型”阶段的问题，或顶多延伸到中期奠基阶段。因此，不论是（新）自由主义或（新）左翼思想，它们本质上都是知识分子延续西方的启蒙理性精神，针对中国的特殊国情，为中国确立发展方向所提出的阶段性“理想”主张。

周晓在以《与国家的妥协：新自由主义和新左翼》为题的发言中，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的两难处境：一方面，左翼和右翼均主动致力于把自己和历来作为国家附庸或批评者的中国知识分子区别开来，拼命与之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双方特别是左翼，又不得不作为国家的批评者而行动。她认为，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曾影响并重构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已经使得朝向旧左翼的复归变得困难。截至目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已经取得了很多了不起的业绩，向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推进颇为出色，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唯有新左翼才关心有关环境、巨大的收入差距、官员腐败、就业保障等民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他们的解释是，毫不犹豫地推进市场经济，市场一旦发挥其机制，便可指望其次要的消极影响趋于消灭。同时，新左翼人士因成为政府政策的批评者，也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成了维护穷人及未能受惠于政府政策的人们的利益的代表性的发言人。她担心，新左翼人士大都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新左翼的影响，正在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最大的威胁，或许会从根本上弱化市场经济之自由的基础。

兴柁一郎的发言题目是《如何面对中国的现实》，主要对自由主义与新左翼论争的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并不光是学术论争，它的背景是激烈变化的中国社会的复杂现实。自由主义者认为共产党一党专制是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主张建立宪政，实现言论与结社自由，实施多党制，保护私有财产。新左派则对资本主义持怀疑态度，同时带有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倾向。两者的共同点是对腐败和贫富差距等社会不公的愤怒，对于何为原因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自由主义者在一党专制中找原因，新左派则归因于市场经济。在政治体制的改革方面，自由主义明确提出以实现宪政为目标，新左派除了批判资本主义以外，没有明确的改革主张。兴柁一郎最后指出，目前，妨碍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是“政治”，不解决“经济自由，政治专制”的矛盾，中国的经济很难持续发展。

绪形康以《当代中国的“公正”与“正义”》为题，按时间顺序梳理了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的线索，他将这场论战分为1994年后、1997年后和1999年之后三个阶段，其细致透彻的分析，使来自中国的主题报告人萧功秦深感佩服。

最后发言的周星以《“华化”、全球化与文化自觉》为题，对“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境遇和动向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在国内外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文化冲击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动向。分析这些动向，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复杂性。截至目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依然面临着如何确立和提升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国民意识这一基本问题。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民族认

同和国家认同，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和文化自觉，将是中国今后很长一个时期都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本场讲演研讨的中心主题，本来是一般民众很少问津的少数知识分子精英们关注的话题，主办者原来很担心能否吸引听众。然而，由于发言内容的新颖、清晰及独特的视角以及听众的高素质，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研讨会中，200多与会者不仅始终聚精会神，而且踊跃发言提问，使研讨会获得了成功。